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6月16日 (第239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称美国对华共识难以持久

任何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避免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陷阱的人都会失望。

中美关系

CSIS 专家分析中国的战略和军事力量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网站 6 月 7 日登载该中心伯克战略项目主席安东尼·科德斯曼 (Anthony H. Cordesman) 的文章称, 自 1990 年以来, 中国的竞争力在几乎所有民事和军事领域都有了根本提高。美国在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力量时应牢记四点:

一是中国强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综合运用。它正在利用这些资产来实现其目标, 而不与美国等大国发生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试图利用制裁等措施来应对, 但它们没有允许国家整合上述行动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二是就非常规战争和重大冲突的各方面而言, 战争的性质都在迅速变化。网络冲突、空间、全领域作战等尖端技术已经急剧地塑造了影响、威慑和实际战斗的能力, 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相对成功, 可能会主导今后几十年的军事竞争。

三是美国大力强调太平洋地区的竞争, 对该地区的关注导致美国低估了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类似“灰色和白色地带”战争的能力。美国一直专注于提高与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这是必要的, 但不能替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军民竞争。

四是现在还不能准确预测中国将如何提升其核和双核/常规战争力量和防御。中国很可能会发展出更先进的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 并专注于低战区级别的常规战争。新的战争形式将使威慑、作战、防御和军控的挑战进一步复杂化。

美智库称中国寻求超越美国的国际与军事战略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近日发布报告《中国寻求全球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确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并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文章还就美国应如何应对提出了建议。

报告认为，中国承认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反对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将主要以欧亚大陆、中东和非洲为中心行使部分全球“霸权”，其特点是依靠金融、外交接触和安全援助来行使影响力，同时保持适度的海外军事存在。

中国与美国成功竞争的标准包括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以下条件：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美国尊重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美国基本上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已经在欧亚大陆、中东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主导地位；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缩减到美洲；美中按照中国坚持的准则处理分歧；两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其条件主要由中国确定。

报告对美国的建议主要包括：更多关注北京通过许多创造性方式来指导军事行动，以便在长期竞争中获得优势的行为。美国的政策应通过展示美国迅速的反应和有效的领导力来削弱中国力量，从而减少其他国家支持北京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改造国际组织的动力。美国国防部可能需要在中东地区保持重要的存在，以此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加强美国的常规能力和投资技术先进的未来部队仍然是关键任务，但军事外交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制定一项包含一定程度的安抚和合作的战略有助于稳定竞争，减少误判和危险事件的风险。

美学者称美国对华共识难以持久

任何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避免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陷阱的人都会失望。

《外交家》杂志 (Diplomat) 网站 6 月 4 日登载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保罗·纳多 (Paul Nadeau) 的文章称, 任何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避免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陷阱的人都会失望。文章摘要如下:

人们认为, 华盛顿最终就中国问题达成了共识, 美中关系被描述为“华盛顿最后的两党合作议题”。这不难理解——中国为美国人提供了他们喜欢与之较量的外国对手, 并为刺激国内产业提供了一个万无一失的理由。

问题是这种共识不会持续太久。只要政治动机导致政党分化, 政党利用分歧来迎合政治基础, 那么任何共识都将是表面的和短暂的。事实上, 任何希望利用“中国威胁”使美国人团结起来的人都会失望。有研究表明, 外部威胁对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几乎没有影响。

目前肤浅的共识并不意味着两党是相同的。事实上, 两党存在重大分歧, 但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 存在差异比差异是什么更重要。在极化的政治中, 两党合作是一种务实考量, 而不在于其本身的价值。一旦务实考量发生变化, 两党合作的需要就会消失。

政治科学的研究表明, 两党合作是一种选举策略, 在政客们想要获得摇摆选民的支持时尤为适用。事实上, 外交政策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楔子问题, 有意通过吸引核心选民、剥离摇摆选民来分化选民。不难看出这一点是如何适用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此外, 选民之间也存在差异。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 支持限制中国实力和增长的共和党人的数量是民主党人的两倍。两党在是

倾向于推广人权还是阻止中国崛起上的态度相左。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新的、不同的想法有什么问题，而是当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仲裁以实际推动政策时会发生什么。这在党内争端中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政治盟友希望对政策过程提供意见并有效地限制拜登可用的选择。

然后是另一个更大、更明显的现代美国存在的问题，即当批评家们只是为了攻击而攻击，并利用区别来制造分歧时该怎么办。还有一种不祥的情况是，为了将自己与拜登区分开来，鹰派人士变得更加强硬，随之而来的风险是，这些人可能会把自己限制在对他们来说可用的选择范围内，并做出更多引发针对亚裔美国人暴力的言论。

美学者建议美国防部专注于应对中国

《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6 月 10 日登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的文章，建议美国国防部削减其他任务，专注于应对中国。

文章称，虽然美国拥有巨大的资源和可行的战略来对抗中国的“军事扩张”，但美国国防机构在执行战略时行动迟缓，并把资源浪费在过时的部队和非关键任务上。要改变这种情况，拜登政府必须明确命令军方将重点放在威慑中国上，并削减其他任务。政府应通过国防预算案和国防战略来使这些命令具体化。政府还应支持“太平洋威慑计划”，堵住美国在亚洲防卫圈的漏洞。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美国有办法遏制中国的海军扩张。虽然中国的国防支出数十年来稳步增长，但美国仅在海军和陆战队上的开支就几乎和中国在整个军队上的开支相当。虽然中国在东亚在战争中有主场优势，但其面临的任务也更艰巨。以台海冲突为

例，中国需要夺取并控制（台湾地区的）领土以取得胜利，而美国只需要阻止中国控制上述领土。

鉴于美国的上述优势，防务专家已经就如何威慑中国达成了共识。美国可以在东亚地区安装高科技“雷区”，在海上和中国海岸线附近的盟国领土上预先部署导弹发射器、武装无人机和传感器，而不是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将脆弱的航母部署到东亚。中国将很难阻止这些分散的弹药网络，而这些网络也不需要大型基地或平台，可以安装在一切漂浮或飞行的载体上。

国防分析师过去十年来一直推销这种方法。然而，美国军队仍然主要依赖少量大型军舰和短程战斗机从暴露的基地运作。中国能够在先发制人的空中和导弹攻击中摧毁这些力量。

这个问题从最高层开始，并自上而下传导。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允许国防部转变为“万金油”。除了为大国战争做准备外，美国军队现在还执行数十项和平时期的任务。军队疲于应付这些任务，事故和机械故障激增。这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五角大楼花费越来越多的钱来维持越来越少、越来越老、越来越过时的部队。

既然问题始于最高层，解决方案也必须从最高层开始实施。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必须命令国防部集中精力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斗，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并削减或取消其他任务。

首先，减少“驻守任务”的数量和范围。目前，每天有数十万名军事人员在世界各地执行导航、飞行、培训和演习任务。这些活动占用和耗损了军队的战斗部队，并刺激采购不适于与华作战的大型平台。其次，尽可能多地向亚洲重新部署空军和海军。美国在近十年前就宣布“转向”亚洲，但其许多军力仍停留在其他地方，如中东。再次，将非军事任务移交给民间机构。如边境安全由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选举安全由国土安全部负责，发

展援助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重新分配这些任务并加强负责这些任务的文职机构，将会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军事化。

美国外交

美学者分析拜登的贸易政策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顾问威廉·赖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的文章称，虽然现在对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趋势，进而做出预测。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希望出台一项政策，确保贸易更公平地为工人分配利益，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时间来评估。拜登是多边主义者，相信联盟与合作。人们可以看到美国重新与国际组织接触，包括努力解决使世界贸易组织陷入瘫痪的争端。

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拜登面临“提供补贴、扶持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挑战。他将试图通过联盟驱动的外交而非单边关税来让各国团结一致解决问题。目前，由于公众和国会中反华情绪强烈，拜登的回旋余地有限。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限制将继续存在，但若中国做出让步，关税可能最终会被取消。同时，“脱钩”将继续推进。

其次，拜登希望重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欧盟已邀请美国就贸易展开对话，而且没有欧洲拜登就无法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欧盟必须决定“战略自主”这个新术语指什么，它是想和美国一起对抗中国，还是想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股力量”。

最后，两大气候和贸易问题是碳边界调整措施和绿色倡议补

贴。在碳边界措施方面，挑战将是如何在大型经济体之间找到共同的方法；在补贴方面，国会将讨论取消“坏的”化石燃料补贴，并支持对“好的”绿色技术补贴。

拜登领导下多边主义的四种方式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的文章称，有关单干还是与他人合作的争论已经结束，关于多边主义其他形式的辩论才刚刚开始。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有四种不同模式的多边主义在争夺主导地位。它们可以概括为宪章、俱乐部、协调和联盟四种世界秩序概念。这四种方式都有各自独特的优点，分别是合法性、团结性、能力和灵活性。

第一种方式以宪章为导向，这给予联合国和其他反映了主权平等原则的多边机构重要地位。尽管存在缺陷，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机构，继续在全球享有无可比拟的合法性。

第二种方式即俱乐部方式，旨在复兴和巩固西方先进市场民主国家，使其成为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核心。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相一致，这一方式将侧重于加强现有的多边机构。

第三种方式倾向以 19 世纪“大国协调”的新版本赋予国际秩序责任。这样一个全球性理事会的成员包括自由国家和非自由国家，它们同意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置于次要地位，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危机，并就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进行合作。

最后是联盟模式，这将优先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合作。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多边谈判桌上各方的身份和数目将取决于全球挑

战的性质、潜在参与者的兴趣以及这些参与者的相关能力。

人们可以在目前拜登的外交政策中找到上述四种模式的元素。拜登宣布美国将“重回”联合国，正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西方俱乐部，同时，他也清楚大多数跨国挑战不能仅靠民主国家解决。但拜登政府没有、也肯定不会做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全球协调机制，来作为多边合作的最高框架。相反，它将依赖于一系列不断扩大的联盟，其规模和成员可以根据具体的紧急情况以及特定国家的利益和能力而调整。

兰德报告分析如何衡量美国防战略准备情况

兰德公司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长期合作，探索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评估国防部对于执行《国防战略》的准备情况。兰德公司6月14日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报告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要求研究团队关注战略准备的七个核心方面：一是军事效力，即面对竞争者时，军队的素质、技能、整合和响应力；二是作战准备，即部队主要元素的状态，如目前是否有资源和训练来执行其所组织和设计的任务；三是兵力态势，即为推进军事战略而在全全球组织、分配和使用军力；四是结构准备，即国防部能够让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尚未做好作战准备的部队能迅速进入可部署状态；五是动员准备，即迅速而审慎地扩大军事力量的结构，以缩小当前实际能力需求和未来潜在能力需求之间的差距；六是持续性准备，即国家及其工业基础能够满足持续不断的对准备就绪的部队、装备、物资和弹药的需求，直到行动结束；七是韧性，即军事力量、军事基础设施和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在所有作战领域中承受、抵抗敌人攻击、(在必要时)迅速恢复的能力。

报告主要发现包括：战略准备的核心方面包含了足够多的准备工作的主要要素，这在评估国家响应各级冲突的总体能力时是有帮助的；作战准备情况得到了很好的衡量和理解，但如果不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可能会产生误导；军事效力与其他六个方面只有微弱的联系，资源变化对其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准备情况将产生持续影响，并且必须与其他部门流程结合来看；场景环境具有显著和可变的影响；这些方法提供了客观的、可重复审查准备情况的机制，但仍然需要相关专家作出解释。

CNAS：美国必须重新平衡其在中东的援助组合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 6 月 10 日发布报告称，美国必须重新平衡其在中东的援助组合，作为强调民用而非军事工具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从安全援助转向发展、民主、人道主义和稳定项目。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为了在中东地区名义上稳定的国家实施更有效的发展和民主项目，美国应该：利用经济援助推进发展和民主目标，而不是维持或改善与威权国家的双边关系；将资金从双边援助转向主要的地区性和功能性基金，从而使美国在资助方面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并在整个地区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项目创造竞争；在日益压抑的环境中，找到创造性的方式与公民社会直接开展合作。

为改善受危机和冲突影响的国家的人道主义和稳定化工作，美国应该：考虑着眼于使冲突降级的政策，而不是偏袒一方或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在美国高层外交接触中，优先考虑人道主义援助，使援助能够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确保致力于稳定的援助服务于更高层次的政策目标。

为确保安全援助有助于地区国家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同时又

不助长威权主义或军备竞赛，美国应该：通过一项明确的、可持续的区域战略来处理安全援助，而不是将其作为维持双边关系的权利或手段；减少对该地区的大规模常规武器销售；以建设有能力执行反恐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精锐部队为基础，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训练，而不是试图从根本上重塑地区军队。

美智库建言北约调整其伙伴关系

北约峰会于 6 月 14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成员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将中国列为北约面临的“系统性安全威胁”。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文称，在当前环境下，北约必须调整伙伴关系，以确保它们继续促进北约的利益。

随着北约重新调整战略方向，将中国纳入更广泛的战略考量，文章就北约应如何调整其伙伴关系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提出了三项建议：

第一，北约应确保能力建设和复原力支持仍然是优先事项。能力建设可以增强伙伴国的制度体系、复原力以及共同安全感。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议保护了与一些伙伴国来之不易的互操作性，国防及相关安全能力建设倡议已经为格鲁吉亚、伊拉克、约旦、摩尔多瓦和突尼斯提供了支持。

能力建设计划也是实现北约与伙伴国之间互操作性的途径，这仍然是非成员国与北约合作的主要动力。这是因为北约提供了国际公认的军事标准，并能够随时加入欧盟、联合国或其他组织的多边行动。北约应该努力减少伙伴国（特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演习的限制。

第二，北约应加快有关中国问题的内部磋商，尽早并经常邀请伙伴国参与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确保北约在决策过程中尽早

听取伙伴国的意见。北约也应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以及那些拥有大量网络或太空利益的国家更好地合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汉密尔顿建议北约与日本和韩国成为“机会增强伙伴国”，以改善互操作性、信息共享和政治协商。

第三，北约应与伙伴国和欧盟开拓新的科技合作领域。在新兴颠覆性技术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为将这些技术纳入军队制定规范和标准，这符合北约的利益。北约的咨询小组报告称，北约的新兴颠覆性技术战略专注于在内部利用成员国的优势，建立一个有凝聚力、以人才发展和新颖的融资计划为支撑的创新生态系统。今年夏天，北约预计将发布一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战略，它应该勾勒出一个更广阔的愿景，将北约的创新生态系统与其伙伴国的创新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总之，北约未来的伙伴关系仍将是需求驱动的，它们应不断发展以帮助北约应对挑战。北约应该为伙伴关系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并为它们提供资金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扩大能力建设以包含更多的复原力支持仍然至关重要，同时，加快政治磋商和推进雄心勃勃的科技合作也很重要。

美国政治/其他

美学者分析拜登 2022 财年国防预算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网站 6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研究员伊莱恩·麦卡斯克 (Elaine McCusker) 的文章，对拜登政府公布的 2022 财年国防预算进行了评估。文章摘要如下：

好的方面是 2022 财年国防预算将延续 2018 年《国防战略报

告》所提出的关键优先事项。预算将为核现代化、导弹攻击和防御以及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提供资金。预算还将为网络空间活动提供更多资金。

不好的方面是国防并不是拜登政府的优先考虑事项。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打算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投资，将国防资金从关键作战能力转移到国内制造、应急响应和其他优先事项上。拜登政府此前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指南》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BM)四月份发布的自由支配预算请求显示了这一点。5月28日公布的白宫预算概要进一步证实了它对国防缺乏兴趣。概要并未提到实际军事能力，虽然简要地提到了“中国威胁”“太平洋威慑计划”，并指出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但它并没有强调与中国进行军事竞争所需的大量投资。

拜登政府还试图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包含的内容，这将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中的非国防开支，同时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防开支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引擎，这个引擎应该专注于建设作战能力，而不是作为应对国家面临的任何或所有挑战的方法。

最后，一个危险的方面是，国防部正在提议对遗留系统撤资，这是有意义的，意味着良好的管理。然而，在没有提出能够弥补失去的能力的计划时这样做可能是危险的。

美学者称美全球声誉显著回升

《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10日登载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项目主任理查德·威克(Richard Wike)的文章称，特朗普对美国全球声誉的破坏不是永久性的，世界并没有放弃美国。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总统在他的四年任期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

的形象和声誉。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美国的全球声誉已显著回升。但许多国际公众仍然怀疑华盛顿对他们利益的承诺，甚至更怀疑美式民主是否仍应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对 16 个发达国家的受访者的调查显示，美国的形象已经恢复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水平。在超过一半的受访国家中，美国的支持率比一年前高出至少 20 个百分点。

拜登更加多边化的外交政策也帮助美国的形象反弹。但是，拜登并没有消除人们对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没有消除人们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承诺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对美国一个长期存在的抱怨是，它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这种看法在拜登任内依然存在。

今年的调查显示，拜登举办民主峰会的计划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仍然需要检查其民主的缺陷。如果要有效地领导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共同体，美国将需要证明民主可以在国内发挥作用，国际合作也可以在国外发挥作用。目前，这些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柱仍对全球各地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美国和其他维护这一秩序的国家必须向其公民表明，对民主复兴和多边主义的承诺能够有效地解决它们面临的许多紧迫挑战。否则，其他政治模式的吸引力可能会增加。

拜登的税收计划引发阶级战争

《国会山报》网站 6 月 9 日登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约书亚·劳（Joshua Rauh）等的文章《拜登的没收性税收计划引发阶级战争》称，拜登的税收政策忽视了这些增税对投资、工作和工资产生的极端负面影响。

首先，拜登论点中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声称富人向税收体系缴

纳的税收份额太低。美国国税局 2018 年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 1% 的纳税人的收入占美国经济总收入(调整后总收入)的 21%，但他们缴纳的联邦所得税超过 40%。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获得了 47% 的收入，但缴纳了 71% 的税收。

其次，拜登提出了各种增税方案，让纳税人自己去计算，但避免披露他试图强加的总税收负担。对企业来说，拜登各类增税措施将进一步加剧其影响。一般来说，上市企业和其他大企业都是 C 类企业，需要缴纳两级税。拜登将把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股息和资本收益税率从 23.8% 提高到 43.4%。2017 年的《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 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 降至 21%，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 C 类企业所有者在分配股利或出售股票时需要缴纳第二级税收。即使在《减税和就业法案》出台后，企业所有者也要缴纳 40% 的综合所得税，这与富有企业所有者现在几乎不用缴税的说法相反。除此之外，还有多个级别的州税需要考虑。加州的企业税率接近 9%，最高收入人群的个人税率接近 13%，纽约市的税率甚至更高。

最后，拜登忽略了其税收计划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能意识到，这种没收性的税收水平会让投资者在冒险之前三思。这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样高的税收使工作遭受严重打击；对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投资减少会导致生产率降低，损害美国工人的竞争力。

拜登政府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税收是强加在那些创造就业的投资人身上的。新政府及其在国会的盟友正试图利用嫉妒和阶级战争的政治来证明，中低收入者只有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再分配才能取得成功，而不是由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刺激的经济增长。

美专家建议美用“盟友外包”重塑经济和外交政策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6 月 8 日登载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经济和金融力量中心高级顾问伊莱恩·德辛斯基（Elaine Dezenski）等的文章称，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合作以重塑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作者提出“盟友外包”（ally-shoring）的概念，即有选择地在贸易和合作生产关系上向美国信任的朋友和盟友靠拢。

文章称，“盟友外包”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原因是，在汽车和其他行业，与其说是从事“贸易”，不如说是不同国家在共同制造东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许多领导人提出要将关键物资本土化。尽管这可以理解并颇具吸引力，但这并不是赢得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有效途径。这不仅会困扰美国的盟友，而且对那些希望继续在外国市场做生意并在产品中使用外国制造的零部件的美国公司来说也是个问题。试图在国内自给地提供许多物资也会降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盟友外包”涉及与那些认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制度的国家采购基本材料、货物和服务。发展中经济体等低成本生产国对于保持供应链的成本效益至关重要，美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建立强大的机构，为制造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透明的供应链。

盟友外包还能增加关键供应链的可靠性，同时减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依赖。重塑关系，促进与分享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的伙伴关系，将减少美国的脆弱性，同时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保持进入各种商品和市场的机会。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重建国内经济的时刻，盟友外包也将有助于带来新的经济机会，在国内创造更多好工作。盟友外包是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助于实现拜登“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承诺。重塑美国的供应链也可以有力地促进恢复美国

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战略联盟，保护和加强民主，并遏制中国等国家的“不良”行为。

美国如何分裂成四个部分

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7日登载美国资深记者和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文章《美国如何分裂为四个部分》，阐述了主导美国社会的四种叙事“自由美国”“聪明美国”“底层美国”和“正义美国”。帕克认为，这四种叙事相互作用，并交替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种叙事叫“自由美国”（free America）。过去半世纪以来，这是四种叙事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自由美国”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建立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强大引擎之上。

这种观念的崛起，来自70年代美国长期的经济滞胀。里根强力给美国企业松绑减税，鼓励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让美国重新获得了活力，使得这一观念大受欢迎。鼓励个人主义的结果，也促成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共和党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来提升社会的公平，拯救美国的社区。相反，他们鼓动起更多对体制的仇恨并积极寻找替罪羊。

第二种叙事叫“聪明美国”（smart America）。这些人是一群专业人士，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职业阶层的顶层，而且受益于全球化的浪潮。他们和“自由美国”的叙事一样，都拥抱资本主义，也不拒绝精英主义。他们和“自由美国”叙事的区别是他们并不反对政府的干预。

和“聪明美国”相结合的是民主党。民主党越是精英化，共和党就越容易用文化认同的方式吸引白人工人阶级。民主党经常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宁可不接受他们的高福利政策，

也要去拥抱共和党的低税收低福利理念。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真正吸引这些共和党支持者的是文化身份的认同。作者认为，在“聪明美国”达到巅峰的时候，已经埋下了特朗普当选的种子。

第三种叙事叫“真实美国”（real America）。“真实美国”或底层美国，根植于美国自由平等的传统，但根子上就有一定的民粹主义成分。在底层美国中，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从来没有消失过。这种厌恶扩展到了对专家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厌恶。他们更希望自己的领导来自平民，而不是精英阶层。

在底层美国的真实情绪中，还包含了白人至上主义，因为美国传统上就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底层美国还有一个与“聪明美国”针锋相对的特点——民族主义，它也导致了孤立主义。21世纪之交的一连串失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传统的底层美国人很难再进行他们传统上对自治和政治的参与。他们的愤怒和绝望，需要一个目标和代言人。特朗普应运而生。

第四种叙事叫“正义美国”（Just America），这是另一种自下而上的反叛。在幻灭的2000年代中成年的年轻一代用强大的有关社会正义的思想来解释他们的世界。而这时候所要求的公正，已经不仅仅是要消除法律和制度上的歧视。这种反歧视更多和个人主义结合，也就是更强调个人的感受。这种氛围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但正义美国也会形成一种强烈的相互仇视。美国之前的文明基本上是白人主导的，所以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打倒美国历史，而黑人犯下的一切暴力活动都是可以原谅的。这种思潮最不理性的部分在于要求削减警察的拨款，这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焦虑和反对。这种简单的黑白对立的观念对美国社会的评价过于负面，也加深了美国的身分政治的分裂。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